

试析中美核不扩散合作

[美] 司乐如 (Lora Saalman)

内容提要：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中美间缺乏互信是导致两国在“打击扩散”问题上产生误解的原因，但真正的原因是两国的利益差异。本文从中国关于核问题立场的历史沿革出发，以朝鲜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为例，阐述了中美两国在核不扩散方面的利益差异，以及中国在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两个阵营之间发挥的调停者作用。本文认为，尽管中美两国的利益并非完全不可调和，但若中美公开加大核不扩散合作，中国会丧失对无核国家的影响，从而不利于防核扩散机制。

关键词：核不扩散 中美关系 朝鲜核问题 伊朗核问题

在中国，许多战略研讨会和有关军备控制的文章，经常提到的一个看法就是“中美间缺乏互信”。然而，一旦谈到“打击扩散”，美中两国间利益的差异、而非互信，往往是导致两国间误解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讲，中国认为核扩散对本国利益的威胁并没有对美国那么大。¹

尽管很多人认为美、中在朝鲜、伊朗等国家上具有共同目标，事实未必如此。通常情况下，中国的参与水平和程度并不是由核扩散对中国的直接威胁决定，而是由美国对此扩散的预期反应决定的。当中国认为美国解决问题的方式极端且动摇了本国利益，或孤立了中国，中国会更主动地在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间发挥调停者的作用。

中国的参与水平和程度并不是由核扩散对中国的直接威胁决定，而是由美国对此扩散的预期反应决定的。

然而，中美之间的这种动态关系并非一成不变。第一，中国虽然是有核国

[美] 司乐如 (Lora Saalman)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

1 另见 <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2011/02/28/china-and-u.s.-nuclear-posture-review/1ci>。

家,但其身份的双重性加大了其发挥作用的难度。中国离美国核不扩散政策靠得越紧,就越可能丧失对第三国的影响力。第二,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上升,同时中俄在伊朗、叙利亚等问题上的团结表明对伊朗等国进行国际孤立的威胁并不能迫使中美在未来进行合作。第三,中国虽然追求稳定,但并不代表必须要找到解决核扩散的持久方法。反之,中国追求在“使美国无暇分神”和“阻止美国可能损害中国经济、政治利益的极端反应”之间实现平衡。美、中两国公开直接的双边协调可能到哪个程度?这种协调能对防核扩散体制有益?理解以上三点原因,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的主要含义。

一、利益不一致

尽管中美两国利益不一致,但这并不表明两国利益完全不可调和。中美利益的不同往往是在程度和问题认知方面的不同。这在中国的政策和言辞中均有所体现。在中国,“防扩散”一词内涵丰富。如果把它放到从积极到消极的语词光谱中,即按照“军备控制”—“防扩散”—“反扩散”的顺序来理解,就能最好地体现“防扩散”一词的意义。

按照上述逻辑,“军备控制”描述的是一种理想,即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双方在核不扩散条约下的平等责任。与之对应,“防扩散”或“不扩散”强调的是使无核国家无法掌握核武器,而非从有核国家手中拿走核武器。上述三个词中最具危机倾向的是“反扩散”一词,该词字面上暗示有核国家可能会对无核国家实施封锁或用武力手段阻止扩散发生。

中国目前在核问题上的立场与毛泽东时期相当不同。那时,“防扩散”被视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用来深化歧视和不平等的一种手段,直至现在,这种看法在中国仍有市场。如今,中国不再促进或支持扩散,且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也逐渐出现在防核扩散体制中。但中国国内仍含蓄地存在一种看法,即某些国家寻求核武器往往是在面对外界威胁时,寻求保障本国生存与安全的一种手段,而它们面对的“外界威胁”通常来自美国。¹

中国一直以来坚持不干涉政策,并且坚决尊重它国主权。在这种政策背景下,中国很难去要求那些寻求核武器的国家放弃发展核武器,来实现国家安全。更何况中国自己也并未放弃研发核武器,这部分说明了中国近年来坚定不移地支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原因。尽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面临很多挑战和与歧视相关的批评,但它毕竟是多边认同的条约,且为中国目前面临的矛盾提供了一套方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完美,但它起码不特别也不专断。而独裁专

¹ “朝核问题:内在逻辑与中国的外交政策选择”,王晓波、宋金泉,《国际观察》,2011年第三期,第50—57页。

断,正是中国对很多美国关于不扩散倡议¹的看法。

根据上述逻辑,损害防核扩散体制的并不是寻求核武器国家的扩散决定,而是有核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言行不一及对无核国家使用武力。许多中国学者认为在伊拉克和利比亚问题上,在核武器问题上的退让等同于本国体制的更迭和崩溃。²在朝鲜和伊朗问题上,制裁并不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制裁只会让朝、伊两国经济体系彻底崩溃。³正如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孙德刚写道:

“西方希望像当年对付伊拉克一样,以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不断加大制裁力度,通过制裁消耗伊朗国力,再伺机推翻政权”。⁴

在中国,防核扩散体制对伊朗、以色列、朝鲜、印度、巴基斯坦的不同处理被普遍批评为双重标准。⁵这样,中国作为有核国家中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同时又是无核国家中的发展中国家,这种身份的重叠,为中国发挥中间人的作用提供了平台。然而必须认识到的是,中国越是认同有核国家的议程,它在无核国家中产生的影响力就越小。

中国作为有核国家中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同时又是无核国家中的发展中国家,这种身份的重叠,为中国发挥中间人的作用提供了平台。

二、作为调停者的中国

尽管中国在核问题上的立场较前有所不同,中国以中间人或调停者的身份行走在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之间,似乎暂时解决了同时属于这两个阵营的矛盾。⁶中国在六方会谈中的东道主作用和最近中国在伊朗问题上表现出的穿梭外交是显著的例证。还有中国学者认为这两件事例是中国考验和证明自身外交才能的一次

1 樊吉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军备控制和不扩散研究中心副主任。他早在2006年11月发表于《观察与思考》上的一篇题为“朝核伊核考验防扩散机制:要核武还是要和平”的文章反映了中国学者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下认知与分析朝核、伊核问题的水平和程度。

2 此观点是基于一系列以伊拉克、利比亚为主题的电视谈话节目和学者文章。本文作者司乐如也参与了2012年2月12日的一期名为“一虎一席谈”的电视访谈。视频网址:<http://v.ifeng.com/news/world/201202/3455e070-baf7-4147-b1d0-8355ceda9355.shtml>。

3 张喆:“IAEA伊核报告考验中国外交”,载《东方早报》,2011年11月10日,A13版。其中引用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言文化系副教授吴冰冰的观点,即“严厉的制裁可能导致伊朗国内体系崩溃的意图”。

4 孙德刚:“中国可将伊核转化为第三次战略机遇期”,载《东方早报》,2011年11月11日,A15版。

5 张喆:“IAEA伊核报告考验中国外交”,载《东方早报》,2011年11月10日,A13版。

6 中国复旦大学为开启二轨伊核问题六方会谈做出了努力。周云:“中国首次主办伊核‘六方会谈’”,载《东方早报》,2008年4月17日,A13版。在官方层面上,2010年3月31日,华盛顿核安全峰会前夕,日、中、美、英、德、法等伊朗核问题有关六方代表召开电话会议。李景:“中美相互示好 伊核无关汇率”,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4月7日,第3页。

机会。¹

中国参与外交事件的意愿除去自身的外交利益和大国地位考量之外,还会考虑反扩散活动可能引发的紧张或冲突。²例如,2003年8月第一轮六方会谈背景下发表的中国学术文章公开提出朝鲜核问题或使美朝步入战争。³当时,在谈到后来被称之为“朝鲜核问题”的时候,中国国防大学研究员徐纬地选择使用的词语是“核危机”,并提出“美国封锁朝鲜”的论断。⁴

类似地,近期,中国参与围绕伊朗核计划多边谈判的意愿同样可由同期讨论美、以是否会使用武力对付伊朗的学术文章中略知一二。⁵如据预测,美国将有可能采取攻击或引发局势不稳定时,中国将会更愿参与到缓和极端做法的进程中。类似的事例表明,只要中国不受美国影响且保持自主性,其政治资本损失就降至最低程度,并能以“诚实的中间人”的身份出现。这与其他国家试图对一些国家施加控制和影响形成鲜明对比。⁶南京政治学院研究生邹向峰和杨成在《党政干部学刊》上写道:“……大国频频插手中小国家事务,既妨碍了国际秩序的公正与合理,又滋长了大国之间相互攀比竞争,过分追求绝对安全的风气。大国协调机制难以摆脱大国利益协调,正所谓‘小国背后有大国,矛盾深处是利益’。例如,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中,各国各有各的优先考虑。”⁷

许多外交事例表明,中国乐于发挥调停作用。在中国调停过程中,美国始终扮演“极度追求绝对安全”的角色,而中国担任着一种与之对应的平衡力量。换句话说,与中国“好警察”的形象相反,美国成了“坏警察”。这种动态对比在朝鲜、伊朗扩散问题的事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下文对这两件事例的分析试图说明中国在采取调停手段时,美国是其参与解决不扩散问题进程的催化剂。

(一) 朝鲜

在全球所有扩散问题中,中国的努力表现出其在朝鲜核问题方面作为调停国是最怡然自得(comfortable)的。这一点能从关于朝鲜核问题的学术文章中略知

1 刘洪洋、陈登勇:“简析朝核问题对中国安全的影响及对策”,载《法制与社会》,2010年1月,第208—209页。邵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朝核问题走向及中国的应对”,载《亚非纵横》,2007年第1期,第43—48页。邹向峰、杨成:“从朝、伊核问题看大国协调机制”,载《党政干部学刊》,2007年第2期,第48页。

2 张喆:“IAEA 伊核报告考验中国外交”,载《东方早报》,2011年11月10日,A13版。

3 沈骥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维护东北亚安全的当务之急——制止朝核问题上的危险博弈”,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9期,第53—58页。

4 徐纬地:“朝鲜半岛核危机的化解与半岛走出冷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9期,第62页。

5 新华网刊载文章“奥巴马:美或军事打击伊核设施的警告非虚张声势”,2012年3月3日,新闻网址: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3/03/c_122784523.htm。

6 李开盛、李小方:“安全结构视野下的朝核问题走向”,载《太平洋学报》,2011年4月第4期。

7 邹向峰、杨成:“从朝、伊核问题看大国协调机制”,载《党政干部学刊》,2007年第2期,第48页。

一二。这些文章显示,中国学者乐于对朝鲜核问题进行评价,积极探索中国在此问题上发挥的作用,以及朝鲜核问题对中国的影响。这些文章还经常颂扬中国政府的参与程度,并且经常提及中美合作。¹ 研读这些学术文章可以发现,中国学者们的分析揭示出中美之间行动与反应的共生关系。

例如,朝鲜2006年核试验后,笔者采访了部分中国学者,他们经常提及的一个看法是,中国在等待美国的下一步动作,从而根据美国的反应来行动。当然,核试验后必然会有惊恐情绪,包括当时中国国内曾使用“悍然”一词来形容朝鲜开展核试验的决定。但是,中国的最终反应仍是更针对美国,而非朝鲜。² 当朝鲜2009年再次核试验时,中国官方的声明中再也找不到“悍然”一词了。³

此外,据许多中外人士说,在面对国际社会针对朝鲜每次核试验之后的制裁动议时,中国会缓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措辞。⁴ 这似乎表明,中国更容易对朝鲜的挑衅行为,而非美国可能的挑衅行为妥协。⁵ 上述事例表明,中国之所以会根据美国的反应来行动是由于中国内在的矛盾的身份,这种矛盾性决定了中国试图与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双方都保持很好的联系。

尽管中国努力在两个阵营中保持独立,中国与美国的立场离得越近,中国离无核国家的立场就隔的越远。吊诡的是,只要中国开展的活动与美国立场一致,美国所希望的中国对朝鲜施加的影响就会变弱。这也是中国学者反复强调中国对朝鲜并没有美国想象中的那种影响力的部分原因。

为了更好地理解上述逻辑,笔者引用了中国学术文章中对中国半岛利益的概括:1. 确保半岛不再爆发战争;2. 确保半岛无核化;3. 确保朝鲜的国家生存;⁶ 4. 确保半岛的和平与稳定;5. 牵制美国在东北亚的战略扩张;6. 保持中美两国战略关系的稳定。与之相对,另一位作者描述美国的半岛利益有以下几点:1. 牵制中俄;2. 保护与控制日韩;3. 稳定朝鲜半岛局势;4. 销毁朝鲜拥有的核武器;5. 防止核扩散;6. 维护核不扩散机制。⁷

以上两个列表绝非详尽无遗,但立刻能看出两者间一个很明显的差距/不同。即关于美国的关切提到了“不扩散”,而关于中国的没有。尽管引文中把无

1 电子数据库显示384篇提到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发挥作用的主要来源论文中,79篇都在讨论中把美国和中国联系起来。

2 从历史渊源上讲,中国行文中使用“悍然”一词一般是用来描述美国或者其他具有帝国主义或极端行为的国家。朝鲜,作为中国同情的邻国,过去从来不会被扣上“悍然”这一帽子。

3 徐进:“朝鲜核问题:中国应强力介入还是中立斡旋?”载《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6期。第146—159页。

4 同上。

5 对朝鲜诸如“天安号事件”或“延坪岛炮击事件”,中国的官方反应也同样较为柔和。

6 徐进:“朝鲜核问题:中国应强力介入还是中立斡旋?”载《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6期。第146—159页。

7 关涛:“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立场的异同”,载《群文天地》,2011年第6期,第245—246页。

核化也作为中国的一个目标,中国更重视的是半岛的稳定和安全。而美国之所以对半岛不扩散如此重视,是因为它的最终目标是牵制中俄和保护与控制日韩。如果美国当真视上述动机为其半岛利益,朝鲜核问题将很难成为中美扩大合作的机会。

以上这些因素都涉及本文开头提出的“互信”问题。然而实质上,信任背后是利益因素在起作用。如果从“互利”的角度来看,中美能达成一致的方面应该包括:1. 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建立一个和平机制;2. 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3. 大国协调,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核问题。中美不同的地方,该作者认为1. 战略目标;2. 无核化与稳定;3. 对“诚实中间人”与“利益攸关者”的认识;4. 对“朝核问题”还是“朝鲜问题”的定义。¹

从合作的角度出发,对在中美利益相同点与不同点的两个列表中都出现的“无核化”这个术语,我们应进一步加以思考。² 每次提到“无核化”这个词,几乎没有分析和讨论朝鲜的核追求是否有其道理。“在中国方面,实现朝鲜去核化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外交目标,但并不是当前中国的最优先目标。对于中国来说,最优先的是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从中国的角度看,朝鲜无核化也是其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但它还不是中国最高的优先重点目标。中国最优先考虑的事情是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³ 事实上,只要朝鲜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威胁,所有关于其是否应该拥有核武器的疑虑都将被打消。⁴

尽管中美有着不同的利益重点,中国学者仍然认为中国在缓和与其他国家根本不同的立场方面能发挥切实可行的作用。中国能够保持参与的程度,而且其调停国的身份并不需要必须标明自身立场,或是损害自身利益。⁵ 相反,调停国的身份能让中国去影响最终结果。《社会发展》所刊文章的选段能够最好地概括这一方式:1. 避免对朝鲜采取过分强硬的态度。中国首要的政策目标是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任何可能导致朝鲜半岛发生动乱的行为中国都应该避免和制止。中国虽然还不具备与美国抗争的实力,但是中国的意图必然是美国政策考虑的一部分,如果中国在对朝政策声明中透露出中美两国间政策的不一致,其实是有利于牵制美国对朝强硬政策的。而且如果中国对朝鲜施加过多压力,很可能会加速朝鲜政权的崩溃。2. 配合朝鲜的模糊政策,为朝鲜争取时间。朝鲜进行核试

1 关涛:“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立场的异同”,载《群文天地》,2011年第6期,第245—246页。

2 何圆:“浅析朝核问题理性抉择的新思路”,载《企业导报》,2011年第12期,第254页。何圆在文章中指出中美两方对“无核化”这一术语的认知不同。

3 蔡舒皖:“论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利益博弈及中国的对策”,载《社会发展》第61页。

4 刘慧、杨海峰:“中国和平发展与东北亚地区安全的理性思考”,载《行政与法》,2012年第1期,第57—61页。鹿音:“东北亚核不扩散面临的挑战”,载《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5期,第36—41页。

5 张青磊:“中国在东北亚安全合作中的身份建构”,载《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9卷第1期,第100—104页。

验,最为直接的一个原因是稳定国内局势,转移国内矛盾,以顺利实现国内政权的交接。在没有实现这一目的之前,可以推测朝鲜不会轻易改变强硬的态度。为了避免美国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中国可以采取一种拖延性政策。在联合国制定针对朝鲜的制裁政策时,中国应适当拖延讨论时间,延缓政策的制定。同时中国在此问题上的表态也应采取一种模糊化政策,以此来制约美国的政策制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即是推动六方会谈,促使朝鲜回到谈判的框架中。中国推动六方会谈,可以在象征意义上给朝核问题降温,为朝鲜争取必要的时间,避免美国的军事行动。

3. 对外减少中朝两国“友好传统关系”的宣传力度。中国现在进行外交宣传时过于强调中朝两国的历史合作和民族感情,这方面既有维持中朝关系的考量,也带有象征性意义的宣传色彩,但中朝这种“表面上的利益攸关关系”大大压缩了中国的外交空间。一旦美国与朝鲜爆发军事冲突,中国将会被置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

4. 在推动朝鲜去核化的议题上,与美国建立相关的双边机制。朝核问题的实质是美朝两国的关系问题,因此中国在处理朝核问题时,美国的利益是优先考虑的。虽然中美两国在朝核问题上的优先目标存在分歧,但是两国具有一个利益重合区,即是推动朝鲜的去核化。可以说两国在这一点上的目标一致,但手段存在分歧,美国趋于强力而中国较为温和。为了避免美国对朝过分强硬而造成朝鲜局势出现动荡,中国可以与美国就朝鲜去核化议题建立双边机制。在国际政治中,合作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便是调合两国利益,使两国的行动趋于一致。中美两国在此问题上既存在利益分歧又存在利益重合,这亦满足了合作的基本条件,可以预测建立这样一个机制是完全可能的。若中美两国建立起一个推动朝鲜去核化的双边机制,将使得中国增强对美国对朝政策的影响力。这既有助于推动去核化,又有助于避免战争的发生。¹

该文作者把中国发挥的作用视为对美方不利于稳定行动的拖延、约束和避免,以上选段表明中国国内存在一种趋势,即朝鲜核问题主要是美国和朝鲜政府之间的事情。² 中国的另外两位学者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可以说,朝鲜核问题的产生是美国敌对政策的合理和直接后果。”³ 事实上,美国对朝鲜政策的敌意和严

1 蔡舒皖:“论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利益博弈及中国的对策”,载《社会发展》,第61页。

2 江天尧:“中国调停外交的实践与分析——基于朝核问题的视角”,载《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1年6月第24卷第6期,第8—10页。胡明远:“浅析奥巴马政府的朝核政策”,载《政治研究》,2009年,第38—39页。雷才丽、舒锐锋:“朝核问题之中国作用的双重性及策略选择”,载《学术探索》,2008年6月第3期,第31—35页。罗援:“中国为什么能在六方会谈中起到特殊作用”,载《世界眼光》,2003年第6期,第34页。

3 刘慧、杨海峰:“中国和平发展与东北亚地区安全的理性思考”,载《行政与法》,2011年,第59页。刘慧:“东北亚地区安全对中国和平发展的现代意义”,载《世界眼光》,2011年第35卷,第7页。

厉是这类文章的主要观点。¹

这种认知取向让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很难接受中美在不扩散问题上的直接合作。中国学者在评价美国的朝鲜核问题政策时,一种刺耳但不常提及的观点是,美国的朝核问题政策是为了掩饰其在亚太地区霸权野心的行为。² 四川大学政治学院的刘洪洋和陈登勇认为:“美国总的国家核心战略是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遏制和削弱一切可能对美霸权地位构成挑战和威胁的力量。在亚太地区,美国通过朝鲜半岛核问题介入亚太事务,巩固美韩、美日同盟,遏制中国的影响力并减缓中国经济的强势发展。朝鲜半岛核问题只是美国全球大战略的一环,是为其国家的核心利益而服务的……从历史、军事、政治、自身安全战略以及中长期发展战略看,朝鲜半岛无核化、朝鲜政权的稳定都有利于维护中国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³

上述引文清晰阐释了中国学者所认为的中美利益的内在冲突。一方面,解决朝核危机将会削弱美国利用朝鲜核问题干涉东北亚地区事务的能力,美国能利用朝核危机强化其盟友关系并遏制中国;另一方面,解决朝核问题和朝美关系的提升能加强美国在此区域的影响。⁴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出现了一股新的认知取向,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应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⁵ 尽管美国并不希望中国发挥这种主动作用。还有些学者,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徐进开始鼓励中国把自己与朝鲜的立场结合得更紧密些。⁶ 这些专家认为作为调停国,中国不太可能付出什么代价,也不太可能利于解决冲突。⁷

以上罗列的分析表明,一些中国学者已能不局限于从美国和朝鲜两国立场出发来看待朝鲜核问题,并且开始逐步超越这个现有观点。当然,随着朝鲜最高领

1 王晓波、宋金泉:“朝核问题:内在逻辑与中国的外交政策选择”,载《国际观察》,2011年第3期,第50—57页。“朝核问题的解决,其钥匙公认掌握在美国手中。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依然没有对其僵硬的朝核政策做出适当的调整。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国际社会的态度成为指引朝核问题走向的重要风向标。国际社会是选择同美国步调一致地对朝施压,还是能同情朝鲜的处境而坐下来务实地共商对策,将对朝核问题的未来发展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

2 关涛:“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立场的异同”,载《群文天地》,2011年第6期,第245—246页。高英彤:“朝核问题中美国因素的现代国际法律评析”,载《东北师大学报》,2010年第1期,第17—21页。

3 刘洪洋、陈登勇:“简析朝核问题对中国安全的影响及对策”,载《法制与社会》,2010年1月,第208—209页。

4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讲师漆海霞在其“国际调停历史与策略的量化分析——兼析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一文中清晰地表述了中国矛盾的立场,2010年第6期,第98—117页。

5 蔡舒皖:“论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利益博弈及中国的对策”,载《社会发展》,第61页。

6 徐进:“朝鲜核问题:中国应强力介入还是中立斡旋?”,载《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6期,第158—159页。

7 王晓波、宋金泉:“朝核问题:内在逻辑与中国的外交政策选择”,载《国际观察》,2011年第3期,第50—57页。

领导人金正日去世和其子金正恩的上台,美朝2012年2月在北京的谈判表明,中国有可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发挥调停国的作用。

(二) 伊朗

当谈到伊朗核问题时,有一种取向是将伊核与朝核问题挂钩。¹然而,这类文章的数量及其讨论的中国在伊核问题上发挥的综合作用明显且可以预见地比朝鲜问题上少。²尽管对于中美在伊核问题上合作的思考相对较少,这并不表示中国在伊核问题上没有利益。中国在伊核问题上的利益正如中国前驻伊朗大使华黎明描述的:“一是伊朗不拥有核武;二是中国在伊朗的利益不受损;三是世界和平不因伊核问题而遭破坏。”³

中国在对朝核、伊核问题上分析层次的不一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较长的调停历史,及中国与冲突中心在地理上的毗邻。中国在伊核问题中的参与也明显出于利益考虑,包括维护中国与一个强大中东政治经济伙伴的关系,更何况伊朗还是中国的供油国。⁴中国若过于与美国主导的议程紧密联系,只会损害其维护中伊稳定关系的能力。重庆西南大学的陈连庆和杨兴礼认为:“如果中国反对伊朗发展核武器,那么中国和美国将会在伊朗核问题上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但是中国和伊朗的关系将会恶化。如若这样,伊朗有可能会采用其手中的‘石油牌’、‘伊斯兰国家牌’来对中国进行报复。中国的中东石油安全系数将会大大降低;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也有可能受到一定的影响,即便是一个强大的伊朗不会使伊斯兰国家感到安全。同时,如果中国反对伊朗核计划,也会使伊斯兰国家和世界看到中国在重大问题上受制于美国的窘态。总之,在处理中伊关系中除了要提防伊朗的‘核问题(武器)牌’以外,还要重点防范伊朗的‘伊斯兰国家牌’以及伊朗的‘石油牌’。谨防伊朗利用手中的石油资源和伊斯兰国家资源对中国进行政治要挟。”⁵

尽管上述分析对中国在伊核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想法与实效进行了质疑,

1 邹向峰、杨成:“从朝、伊核问题看大国协调机制”,载《党政干部学刊》,2007年第2期,第48页。刘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2007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展望”,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年第1期,第54—55页。

2 研究表明,36篇提到中国在伊核问题中发挥作用的文章,只有7篇在论述中把美国与中国联系起来。

3 华黎明:“伊朗核问题及其对大国关系的影响”,载《和平与发展》,2010年第2期,第35—39页。

4 李国富:“伊朗核问题的症结与中国的立场”,载《当代世界》,2007年10月,第23—26页。陈连庆、杨兴礼:“简论伊朗核问题对中国—伊朗关系的影响”,载《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9月第7卷第9期,第79—81页。

5 陈连庆、杨兴礼:“简论伊朗核问题对中国—伊朗关系的影响”,载《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9月第7卷第9期,第79—81页。

中国的作用并非可以完全忽视。¹实际上,随着中国不断增长的能源安全利益和它在中东地区的参与程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伊核问题能对中国一系列的经济政治政策产生不少于朝核问题的长远影响。这其中包括“维护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尊严;回击了西方在核问题上的双重标准;防止中东出现更大的动荡,维护中国能源安全;有利于落实中国的大周边战略,维护西北边疆的安全”。²

除了上述利益之外,大部分学术文章并不认为中国在伊核问题上应追随美国的立场。³反之,正如朝鲜核问题一样,中国学者把伊核问题主要并且直接视为是美、伊两国之间的关系。⁴这类文章中即使提到了别国的名字,也是作为“大国之间的博弈”的部分提到的,美国在伊核问题中的作用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只是作为“相对超脱”的一方。前大使华黎明写道:“伊朗核问题尤其使美俄、美欧和美中关系面临严峻的考验。伊朗是美国控制中东乃至整个欧亚板块志在必得的战略要地,在反美的伊斯兰政权统治下的伊朗更是美国的心腹之患。对美国而言,核问题只是更迭伊朗现政权的一个切入点,其战略意义远胜于核扩散本身。俄罗斯、欧盟和中国在核不扩散问题上与美国有共同语言,但是,各大国在伊朗又有各自的特殊利益……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是当事国,欧盟是居间调停的一方,俄罗斯是深深卷入的一方。而中国则是相对超脱的一方。在伊朗核问题上,中国既不可能像在朝核问题上那样充当东道主的角色……中国不会唱主角,但又拥有关键的一票……美国以怀疑的眼光误读中伊关系,在伊朗核问题上对中国的立场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并以此‘检验’中国是否是‘负责任的国家’。这将不可避免地对中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也不利于伊朗核问题的顺利解决。”⁵

这篇文章一方面认识到在联合国安理会中,中国能在伊朗核问题上发挥很大的作用,正如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所展示的那样;另一方面,文章内容仍存在低估

1 “在伊朗核问题上,中国既不可能像在朝核问题上那样充当东道主的角色,也不可能像俄罗斯那样去扛旗和挑头。在伊朗核问题的舞台上,中国不会唱主角,但又拥有关键的一票。中国最关切的是:一、伊朗不拥有核武;二、中国在伊朗的利益不受损;三、世界和平不因伊核问题而遭破坏。美国以怀疑的眼光误读中伊关系,在伊朗核问题上对中国的立场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并以此‘检验’中国是否是‘负责任的国家’。这将不可避免地对中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也不利于伊朗核问题的顺利解决。”华黎明:“伊朗核问题及其对大国关系的影响”,载《和平与发展》,2010年第2期,第37—39页。

2 “在伊朗核问题上中国的一贯立场是承认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维护中东的和平与稳定;主张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伊核危机;反对以全面制裁和单独制裁伊朗,制裁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反对西方通过用武力或者武力威胁迫使伊朗屈服。”王富忠:“核危机中伊朗的突围与中国的立场”,载《昌吉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73—76页。

3 同上。

4 孙伟:“伊核问题的升温与化解”,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年第2期,第59—63页。“伊朗——又一个伊拉克”,载《兵团建设》,2006年第3期,第40—41页。王富忠:“核危机中伊朗的突围与中国的立场”,载《昌吉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73—76页。金良祥:“美伊争斗波及中国能源安全”,载《中国石油石化》,2007年第2期,第38—39页。储昭根:“美国单边主义与伊朗核危机”,载《观察与思考》,2006年第21期,第26页。

5 华黎明:“伊朗核问题及其对大国关系的影响”,载《和平与发展》,2010年第2期,第37—39页。

中国综合影响力的倾向。鉴于上述分析来自一位退休的中国官员，它表明中国参与伊核问题的意愿并不一定有利于伊核问题的长远进展。反之，它有可能不断地激发危机。当然，仍有迹象表明中国学者在探索中国如何在伊核问题上发挥超越调停国身份的作用，以寻求更有意义地参与解决问题的进程。徐立凡早于2006年就在《华夏日报》中特别提到：“在伦敦会议的六方中，中国是唯一的亚洲国家，与伊朗的经济联系也最为密切：伊朗是中国最大的原油输出国。除此之外，中国和伊朗在传统上的文化联系远比其他五国长久和融洽，中国更能理解伊朗的关切。这决定了中国在六方会晤中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中国的独特视角可以为危机的和平解决带来新的机会，中国可能在六方会晤中发挥关键、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¹

上述引文无论发表在学术期刊或新闻媒体上，都能转化“中国缺乏影响力”这一被经常提及的观点。中国能在伊核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潜力在2010年变得格外显著，当时发表的学术文章在重视美—伊动态关系外也开始讨论美、伊、中三国形成的三角关系。² 美国或以色列方面可能的袭击，国际社会对伊朗的辱骂和孤立都可能会损害中国的利益。为防止美、伊、中三角平衡关系的破坏，上述因素将继续作为中国参与解决伊核问题的催化剂。³

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利益曾一度妨碍中国参与制裁和指责伊朗。今天，为了稳固中国的能源供给，相同的经济利益使中国不得不加大参与伊核问题的程度。美、以是否会对伊朗采取攻击，这个问题强烈激发了中国的国家意识，伊朗的崩溃和骚乱会对中国的石油供给链产生巨大的爆炸性影响。毫不令人吃惊的是，能源安全与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是中国近来参与讨论伊核问题的主要因素。⁴ 即使不考虑上述两个主要因素，中国也能再次找到在伊核问题中担当调停国的契机。孙德刚认为：“伊朗对中国外交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目前中国正处于从地区大国向地区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国际秩序的和平与稳定，不仅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阿拉伯革命之后，中东伊斯兰势力的上升、伊朗核问题愈演愈烈，西方与中东伊斯兰反西方势力恐将第三次‘对决’……奉行和平、稳健的外交政策，充当斡旋者，阻止中东地区再次出现流血冲突与人道主义灾难，是中国和平发展与构建和谐世界的应有之举。”⁵

1 徐立凡：“伊核僵局需要中国智慧激活”，载《华夏日报》，2006年1月17日，A2版。

2 陈连庆，杨兴礼：“简论伊朗核问题对中国—伊朗关系的影响”，载《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9月第7卷第9期，第79—81页。蔡舒皖：“论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利益博弈及中国的对策”，载《社会发展》，第61页。

3 陈连庆、杨兴礼：“简论伊朗核问题对中国—伊朗关系的影响”，载《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9月第7卷第9期，第79—81页。

4 孙德刚：“中国可将伊核转化为第三次战略机遇期”，载《东方早报》，2011年11月11日，A15版。

5 同上。

这段引文概述了在伊核问题上,中国并不仅仅存在对核扩散问题的关切。中国参与解决伊核问题是被放在中国成为一个强大国家并且追求和谐世界的大背景下的。尽管有些人认为这两个目标相互矛盾,在中国的话语思想中“强大国家”和“和谐世界”是同一趋势的不同部分。中国的作用越来越被视作是制衡美国方面会带来不稳定的行动,这在叙利亚、伊朗问题上都有所体现。¹

如果将这种思维方式延续到外交上,通过改变或调合美国利益,它将有可能使中国获得超越冲突本身的国际道义高度。² 2012年3月关于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及德国在伊朗问题六方会谈后的通报,表明这种思维方式及其象征意义为中国学者所支持。³ 孙伟认为:“解决伊核问题的关键是将美国也融入到会谈中来,最终组建由美国、欧盟三国、俄罗斯、中国与伊朗的伊核“五方会谈”机制。构建伊朗版的朝核“六方会谈”机制便于各方加强协商,增进共识,将可能是解决伊核问题的化解之道。”⁴

这次会议是为了继续2009年中止的谈判,这与近年推动重启朝鲜核问题谈判惊人相似,且有关朝鲜核问题的谈判也是在2009年中止的。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也许不能像在朝鲜核问题上发挥东道主的作用,但它仍最有可能成为一个关键的调停国。

三、阻止危机

总体看,中国防扩散政策更多的是关注美国,而非扩散行为本身。在中国国内,扩散通常更容易被解读为美国政策和行动的表现。在朝鲜问题上,美国政府拒绝为平壤提供安全保障;在伊朗问题上,正是美国对伊朗的威胁及其对待以色列核项目的不同态度激化了扩散。

因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其中国政策或防扩散政策每四年都将相应有所变动。由此自然产生的一个疑问就是美国的承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

当某一国成为问题的主要症结时,就很难要求其他国家与其协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另一妨碍中美公开直接合作的因素是一个现实状况,即很多过去由美国发起的与扩散有关的制裁都是针对中国的。同时需要留意的是,因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其中国政策或防扩散政策每四年都将相应有所变动。由此自然产生的一个疑问就是美国的承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 近期,美国对中国珠海振戎公司与伊朗交易

1 在中国,除了许多媒体专家持有这一观点外,笔者于2012年2月2日参加的一场内部讨论会上,一位清华的高级专家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

2 刘利斌、王波、邹德号、李学军、赵毅:“伊核问题:六方会谈达成共识”,载《人民日报》,2006年5月10日,第3版。

3 杰·所罗门和劳伦斯·诺曼:“美国试图使伊朗承诺谈判”,载《华尔街日报》,2012年3月7日,。

4 孙伟:“伊核问题的升温与化解”,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年第2期,第59—63页。

的制裁使人们开始关心,类似的惩罚是否会针对其他中国公司。

当然,这也不能排除一个事实,即中国对他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也曾经因为与防扩散相关的制裁获益。正如本文前面所描述的朝鲜、伊朗两个案例。这两国数十年被美国的孤立使中国成为这两国主要的和最具影响力的资助方。尽管如此,随着中国经济利益日益全球化,国际体系的冲击会严重影响这一日积月累的利益基础。中国在六方会谈中努力发挥积极作用和摆脱对伊朗石油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对“受到极度孤立的市場可能同时是一种风险”的理解。当然这里面有一个程度问题,因为“极度”往往是不稳定的。

阻止危机的愿望尽管从好的原则出发,但也有可能引发意料之外的结果,比如当威胁被认为是压力,或被误判为虚张声势的恐吓时。如果中国误解了美国承诺和意愿的程度,中国可能会给其实是正当的一些举措设置障碍或干脆无动于衷,两种方式都将导致事态的恶化。中国的这一方式会给美国带来高昂代价,美国政府承担大部分的间接成本和指责,通过采取制裁或军事行动来施加自己的影响,中国却在一个更好的立场上,可以利用这一冲突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或扮演外交调停者的角色。

因此,中国恰相反,它最可能采取防范危机和避免其自身受到孤立的行动。当面对不稳定情况时,中国会不得不采取一个更主动的姿态,无论是核试验,有可能发生的军事打击,还是会损害中国利益的国际制裁。中国行为的动机更多源自外界对扩散的反应,而非扩散行为本身。甚至对于还未发生的预期中的核扩散,中国仍会把这一问题与美国相联系。¹在把如此多的权力和影响放到美国身上后,一个由此产生的大问题是,中国“如何”,或更重要的是,中国“能否”在美国没有采取行动的情况下,在扩散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

在此之前,中国还没有面对过这种问题。部分原因是通常被忽视的俄罗斯的关键作用。²在处理核扩散,特别是伊朗问题上,每一篇分析文章都将中俄两国的立场归为和美国与欧盟立场相对立的一类。³问题焦点再一次变为制衡西方国家的野心。

加上俄罗斯后,一对共生关系再次出现,而这一关系框架几乎不可能对中美的全然合作有利。这表明在核扩散问题上,全然合作更容易也更能在中俄之间达成,而非中美。孙伟提供了一个关于中俄战略关系的概述:“伊朗对中俄两国有着重要的战略利益,危机时刻伊朗会以中俄为战略依托同美欧对抗,这是国际社会所不愿看到的,也是中俄所竭力避免的……应该说,中俄在伊核问题上有着基

1 例如,当讨论日本是否有一天会拥有核武器时,经常听到中国专家提到美国应取消对日本的扩张威慑。当问及日本是否有发展核武器的意图,在中国经常重提的老调是美国将阻止日本的这一行动。核不扩散与裁军国际委员会东北亚区域会议,2009年5月21—23日在北京召开。

2 孙德刚:“中国可将伊核转化为第三次战略机遇期”,载《东方早报》,2011年11月11日,A15版。

3 “伊朗——又一个伊拉克”,载《兵团建设》,2006年第3期,第40—41页。

本相同的立场,但是俄罗斯视伊朗为其中东政策的支轴,在经济和军事上同伊朗强化合作关系。因此,俄罗斯比中国在解决伊核问题上的分量更大一些。中国将积极支持俄罗斯,将俄罗斯推向解决伊核问题的前台。俄罗斯与伊朗的关系就像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如果俄罗斯不能像中国对待朝核问题那样,说服伊朗放弃核计划,那么它将面临进退两难的外交窘境:行使否决权,阻止制裁行动,或同意进行制裁。”¹

尽管这篇文章和很多战略对话的核心问题是关于美国和中国在防核扩散问题上的协作,但其他国家,尤其是俄罗斯的影响不能被忽略。²正如一篇文章中提到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双方在伊核、朝核问题上密切配合;俄欲借华平衡美战略压力,比以往更注重发展对华关系”。³

当中俄利益与美欧对立时,很难预想像关于伊朗问题的多边谈判这样的会议能否得到持久的结果。最起码的一点是,即便俄罗斯和欧盟加入这一较量,在防核扩散问题上中美两国间仍具有很大程度的共生关系,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合作并不总意味着要坐在谈判桌的同一边。

即便俄罗斯和欧盟加入这一较量,在防核扩散问题上中美两国间仍具有很大程度的共生关系,合作并不总意味着要坐在谈判桌的同一边。

结 语

尽管中国的专家经常提及互信,中美之间的更大合作关键在于中美要有相互的利益。为了获得中国更大程度的参与,把这些利益因素考虑到讨论中来至关重要。如果这个事件本身不具有吸引力,或仅基于抽象的防核扩散理想,这个事件本身不太可能具有太大的吸引力。在中国,对评估美国的行动有一种基本假设,即采取这些行动是为了最大化其本国利益,无论这些目的是含蓄的还是公开的。

在中国有一种普遍的认知,即美国的防核扩散活动背后有从石油剥削到政权更迭的一系列动机。美国防核扩散的行动鲜有被从防核扩散本身的需要去理解。当然,如把这种估计作为理由的话,相同的逻辑也适用于中国。⁴需要一个使人信服的论证和基于利益的逻辑推断,来解释为什么中国参与防核扩散行动最符合中国的利益。

因此,必须要提前判断,中国是否会从防扩散行动中获益。关于制裁,中国不太可能同意会损害中国公司利益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制裁,但它并不必然会阻碍

1 孙伟:“伊核问题的升温与化解”,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年第2期,第59—63页。

2 何圆:“浅析朝核问题理性抉择的新思路”,载《企业导报》,2011年第12期,第254页。

3 刘卿:“2007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展望”,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年第1期,第54—55页。

4 投射可以被定义为乙方由于甲方自身的态度、情绪或假设所产生的影响。

那些能利用美国对一国的孤立来获得中国对该国市场更大进入权的制裁。尽管中国不可能永远参与制裁,但并不必然注定它会反对这类行动,除非这些制裁会直接损害中国的经济或其他利益。

至于军事行动,中国不太可能为了防核扩散表现出采取军事行动的意图和意愿。但在美国或其他国家确实会发动攻击或展开其他引发不稳定的行动时,中国更可能会有所作为予以阻挠。这可以从中国在伊朗问题上的表现看出,当时中国的国内报道关注的是美国或以色列是否会攻击伊朗。这一事件对中国的石油供给和市场会产生何种影响是中国国内关注的中心问题。这再次表明,问题并不在于扩散本身,而在于美国的反应以及美国的反应对中国利益会如何造成不利影响。

如果预计中的美国反应越激烈,中国越有可能参与进来并试图抑制这一结果。但在扩散问题上,中国的上述角色不应被视之当然。例如,在伊拉克问题上,尽管中国反对美国的行动,但它对这一问题的参与程度还是相对较低的。事实上,一些学者认为,美国针对一些国家如此强烈的反应,曾常为中国带来战略性机遇。“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和平发展得益于两次战略机遇期。第一次是在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伊拉克对美国长达十年的牵制,使中国获得十年战略机遇期;第二次是在2001年“9·11”之后,中东反恐成为美国的主要任务,中国再次获得十年战略机遇期”。¹

根据这种看法,中东局势代表了中国的第三次战略机遇期。当美国疲于应对其他事务时,中国就有了发展的战略空间。美国制裁伊朗石油市场和约束与朝鲜关系为中国提供了更大的经济和政治空间,尤其在面对美国“转向”(pivot)亚太的情况下。

在中国看到自己在国际秩序中的利益不断增加时,仍存在一种将防核扩散视为美国与扩散国家之间事情的一种取向。中国的角色一直以来并将继续是调停者之一,而不是要站到哪一队中。²但这并不必然是一个负面进展,因为,在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中间确实需要一个“桥梁”来联系双方。中国保持自主以及不让自己和美国联系得太紧对增强其影响力是有利的。³

在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中间确实需要一个“桥梁”来联系双方。中国保持自主以及不让自己和美国联系得太紧对增强其影响力是有利的。

同时,中国并不总是按照美国所需要的那种方式施加影响。任何极端结果或是孤立与中国所认为的对其发展至关重要的事物都是对立的。因此,中国采取的措施表明,尽管中国会为阻止冲突努力,但它可能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的决心。如果扩散从根本上来说对美国的损害比对中国的更大,这更会减少中国寻求持久

1 孙德刚:“中国可将伊核转化为第三次战略机遇期”,载《东方早报》,2011年11月11日,A15版。

2 刘卿:“2007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展望”,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年第1期,第54—55页。

3 张喆:“IAEA伊核报告考验中国外交”,载《东方早报》,2011年11月10日,A13版。

解决方案的动机。

一方面让美国对别的事情疲于应付，另一方面中国扮演着调停者的角色和所有的国家做朋友，这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双赢的境况。但这又给中美合作是否有强有力的基础提出了疑问。从一些方面来看，中国与美国的共生关系是调停者和强施者（enforcer）的关系。如果双方以直来直去的方式开展合作，这对防核扩散机制未必一定有利。中国的政策离美国或其他有核国家越近，无论是制裁、军事施压或其他方式，无核国家将越不可能听从中国的调停。

（蒲庄怡 译；凌岳 校）